

今日观察

来稿邮箱:zzwbsy2013@163.com 新浪微博:@枣庄晚报-声音

村民舍身拦火车,奖1万元够吗

□ 董平

只有首先保证见义勇为不会使自身利益遭受太大损害,在社会公德心和良知的驱使下,才会有更多的人像这位老汉一样,关键时刻选择挺身而出。

据报道,7月15日下午5时,河北涞源县山区大雨倾盆而下,山上下来的巨大泥石流淹没了京原铁路王安镇段,这时恰巧一列火车开来。在附近躲雨的村民卢伟发现这一险情后,奋不顾身拦下火车,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。卢

伟因此丢失了20多只羊。铁路方面颁给他一面锦旗,并奖励一万元。很多网友表示,太少了。

且不说危急时刻拦火车的行为,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胆量,从鼓励见义勇为的角度看,1万元的奖励显得有些少;就算从损失价值4万元左右的羊的实际出发(据村民自己介绍,丢的绒山羊每只价值2000元),村民这次的见义勇为,也让人生出“亏大了”的感慨。

当然,村民拦火车的行为,后续会不会被相关部门认定见义勇为,有其他形式的奖励,现在还不能断言。按照本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刚审议的《河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

例(草案)》,当地见义勇为人员的最高奖励额度将由原来的5万元以上增至10万元以上。

不过对见义勇为的奖励,和对因见义勇为导致的损失的补偿,还是不能混为一谈。这种救济也需要更明确的法律规定,应有一部全国性的法规对见义勇为的救济做出具体规定。比如,将以受益人受益多少为参考变为以“见义勇为者受损多少”为补偿的主要依据,将一些法律条文变“可以”为“应当”,使得受益人应当承担的“义务”具有可执行性。

也就是说,见义勇为中报酬请求权的范围应当包括:对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的补偿以

及一定的报酬。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包括身体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。身体的损害由法律确定一定的补偿标准,而财产的损害则根据见义勇为者具体的财产损失给予补偿。至于一定的报酬可视情况而定,法律可以加以规定,但并不强制,要考虑到见义勇为者的受损害情况、报酬的必要性以及受益人的经济状况等。

规定见义勇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,这对提倡见义勇为也是非常实际的引导。因为只有首先保证见义勇为不会使自身利益遭受太大损害,在社会公德心和良知的驱使下,才会有更多的人像这位老汉一样,关键时刻选择挺身而出。

画里有话

目前北京周边燕郊一带楼市不景气,为了充业绩,销售人员雇用演员扮演前来看房的暴发户,每雇人看一个楼盘,销售者可获80-120元报酬,同时每天向每位演员支付80元“工资”。

(7月27日《经济观察报》)

楼市不景气,大家来演戏。我编你来演,双方都得利。管你急不急,市场在哪里。诚信先丢掉,谈何做生意?

配诗/李军
图/刘道伟



网言个论

为医院定“死亡率”当三思

□ 范广阔

日前,国家卫计委发布两份征求意见稿,对二级、三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提出明确标准,医生们的“吐槽”集中在标准中对于住院患者死亡率的规定。

(7月27日《广州日报》)

征求意见稿中的标准:二级综合医院:住院患者死亡率不超过0.4%,住院手术死亡率不超过0.28%。三级综合医院:住院患者死亡率不超过

0.8%,住院手术死亡率不超过1.4%。指标化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,但是以死亡率作指标弊端很多。

其一,医疗实践证明,实力越强的医院,水平越高的医生,死亡率可能越高,这是因为危重病人往往首先被送往实力强的医院,而水平高的医生做的又是最复杂最困难的手术,治的是病情最危重、死亡率最高的患者。结果在“手术死亡率”这样评判标准面前,他们可能得分最低,面临不达标的风险。

其二,一些医院为了死亡率达标,可能不敢收治过多的危重病人。

还有些医院,则可能会为了“稀释”住院死亡率而收治一些本来不需要住院的常见病患者,这又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,最终也无法达到“推进分级诊疗”的目的。

其三,医院和医生在死亡率达标压力之下,必然会产生危重患者该收治不予收治,该住院不予住院的情况,甚至在病人快不行了的时候被劝出院的现象,那么势必会加剧医患矛盾和冲突。

国家卫计委制定死亡率标准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,但是却很难经得起现实的检验。还是三思为好。

晚报观点

羡慕安宁的生活环境

□ 石平(本报)

亲历了香港和深圳生活的人曾这样感叹:你在香港,我在深圳,我们之间只有一水之隔,我和你同是打工仔,我每个月的工作只有4000元人民币,而你每个月的工资是三万港币;我在深圳,你在香港,你每天经历的是LV、明星、富豪、法拉利、高楼,而我在你眼中只是第三世界人民;我在深圳,你在香港,你每天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就可以穿名牌衣服,戴法国手表,而我每天加班工作,只能穿地摊货,住城中村;我在深圳,你在香港,你拿着香港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全世界158个国家和地区,而我拿着深圳护照,连香港也去不了;其实,对笔者来说,香港人少没有噪音骚扰的安宁生活环境才是最让人羡慕的。

比上述噪音管制更让人钦佩的是,为了照顾机场周边市民生活,减少飞行噪音对市民的干扰,香港驻军还会根据香港居民晚睡晚起的习惯,将上午训练时间推迟到9时以后开始,晚上提前在22时结束,飞行高度再提高150米;开展常规性的跨营区机动演练、各类军事演习活动时,驻军均下发演习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,遵守香港的法例规定,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。另外,驻军在港内的所有营区,均不响起床号而改用闹钟,而且在日常行军过程中,减少行进中的口号。

驻军每次组织实弹打靶、舰艇出海、飞机升空训练,都会产生一定的噪音,部队进驻香港之初,就已关注到这些问题,因此,每次有活动,均会提前向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预先通报情况,刊登宪报,遵守有关练靶场、航道航行以及空中管制的法律规定。这些是驻军在全军部队中独有的,其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干扰。

香港的人口密度在全球城市中排名前列,倘若不治理好噪音污染,生活状况简直不可想象。然而香港做到了,管理到位和互相体谅使城市达到了高度文明。对比一下我们的生活空间,以光明广场为代表,广场舞和其他各种活动噪音污染我行我素、随心所欲,周边居民苦不堪言。在广场这个公共空间里,每个人都应有互不干扰和互不侵犯的默契。在广场里,你可以唱歌跳舞打拳舞剑,但前提是不能无视周边人和过路者的存在,不能对别人构成困扰。

近年来,和噪音污染孪生的广场舞在内地风风火火,最近大妈们更是冲出了亚洲,“攻占”法国卢浮宫,俄罗斯红场。对于在内地备受争议的噪音扰民问题曾被泼粪、开枪、放狗咬,香港又是如何管理解决的?根据香港现行的有关规定,任何个人和团体在使用广场时都必须符合“在露天场地举行娱乐活动的噪音管制指引”,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。规定指出,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之间,活动产生的噪音不能比当时的背景噪音高出10分贝,过了这个时段,更是不允许进行彩排、舞台拆卸等活动,确保没有噪音影响周边住宅。

一般情况,如居民或团体欲申请借用以举办慈善活动(如文娱节目、教育推广、展览等),须于活动开展前7个工作日向有关的屋邨办事处递交申请表格。获准后才能举行,并严格控制时限和音量。如果有人触犯该法例,将可能会被检控。内地大妈在香港跳广场舞,就曾因音乐声大被管理人员制止就是例证。

微言大义

【航班大面积延误】

◎ 城规田宝江(副教授):最近华东机场大面积延误,今天又看到深圳机场乘客和地勤发生冲突上演全武行,其实很多时候航空公司也是受害者,受制于天气、流控等各种因素。发生冲突很大程度是由于双方缺乏信任和沟通,最主要是信息不透明。乘客有知情权,但往往没人给说法,求告、投诉无门,加上延误后各种服务跟不上,更加剧了矛盾。

◎ 中青报曹林:上海发布大面积航班延误橙色预警。发这种预警,是警告人们别坐飞机,还是警告航空公司别安排航班?

◎ 琢磨先生:去年夏天,从洛杉矶飞纽约航班因为机械故障无限期延误,很多乘客立刻坐地上或者看书,或者玩iPad,或者干脆就地一躺睡起觉来。我在想

他们为什么不闹不砸柜台不骂服务员?一是有法律,如果闹就面临拘捕。二是有诚信,航空公司绝对不把机械故障说成天气问题以逃避补偿。三是有规则,乘客的利益会得到保障。

【其他】

◎ 龚明医生:北京多点执业一天,行业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,每一个医生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多点执业,只有更多的医生行动起来了,老百姓才有更加舒心的医疗。

◎ 廖睿(律师):吴英举报东阳市副市长陈军受贿,当地政府否认。副市长是否“受贿”,应该由检察院调查并得出结论,市政府根本无权得出自己是否受贿的结论。

◎ 琢磨先生:去年夏天,从洛杉矶飞纽约航班因为机械故障无限期延误,很多乘客立刻坐地上或者看书,或者玩iPad,或者干脆就地一躺睡起觉来。我在想

百姓说话

别给“啃老族”留下啃的空间

□ 李飞

关于“啃老”社会现象,山东省拟立法保护老年人不被“啃老”而引发热议。笔者认为“啃老族”的病根并不在“啃老”一族,而在父母的观念,在引导、教育孩子上存有误区。微软公司创始人、世界首富比尔·盖茨的故事人尽皆知,拥有一子两女,在退休的时候,将4000亿家产全部捐给慈善事业,一分一毫不留给子女。比尔·盖茨认为:拥有不劳而获的财富,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非好事。

当今社会,许多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,父母关心爱护孩子是理所当然,但关爱过度就变成了溺爱。唯恐孩子受了委屈,事事依着顺着,年龄渐长坏脾气也见长了不少。岂不知久而久之,让孩子养成了依赖感,在心理上难以成熟。这既让父母伤了脑筋,也让子女失去了战胜困难、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机遇期。

不经风雨难见彩虹,“啃老族”只因为啃,是有啃的空间,不愿走出父母的怀抱,怕苦怕累怕脏,不敢面对社会。试想一下,父母能陪伴你一辈子吗?下半辈子独立生活的资本在哪里?作为父母亲要痛下决心,早早地给孩子“断



近日,山东省拟订禁止“啃老”现象的又一轮讨论热潮。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,而没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,以至他们即使长大成人,在心理上也很少真正成熟,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,认识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。另一方面,社会没有给教育生产线上,每年数百万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展机会,在就业难和高房价的压力下,“啃老”成了一些年轻人唯一的选择。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,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。

各位读者,你如果对“啃老”问题颇有感触,欢迎拿起笔来,写出你的心声。